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对 社会主义财政的猖狂进攻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中，确定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和平改造的道路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1956年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表明党创造性地在六亿人口的国家中实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赎买”政策。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极大部分，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比优越和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感召下，他们逐渐地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也还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的右派，不甘心就此走下历史舞台，还想寻找机会向工人阶级进攻，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仅仅有了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只有取得这个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借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明证。

当资本主义私有的生产资料的极大部分已由国家支配的现状下，资产阶级右派很难再在经济活动的领域中进行直接的行动，于是他们就在政治、思想领域对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对我国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他们看来，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党的领导，已经发生了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右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就四处点火，声言要共产党下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们同时就把进攻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财政领域。资产阶级右派向财政方面的攻击，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有社会主义财政制度、财政政策、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财政理论等等方面。我们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财政的猖狂进攻。

资产阶级右派，为篡夺国家财政工作的领导权，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开路，他们首先对财政工作进行恶意的诋毁，想一手掩天下人之耳目，抹煞财政工作的巨大成绩。右派分子说，国家财政工作“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并且，右派分子还危言耸听地说，“目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在他们看来，1956年财政工作是搞糟了，这就是“危机”的根据。

尽管右派分子说1956年的财政工作是搞糟了，但是事实还是向人们作证明说：1956年的财政工作是成功的，成绩是巨大的。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5年增长了15.82%，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是增长得相当快的一年。1956年国家预算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为159.15亿元，比上年增长22.81%；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139.86亿元，比上年增长62%。为了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增发了农业贷款20.3亿元。同时，在1956年的国家预算执行中，我国遭受了几十年罕见的大灾荒；为了帮助农民战胜灾荒，国家增加了许多开支，动用了一部分库存物资。正因为1956年国家预算保证了各项资金的供应，帮助灾区人民度过了严重的灾荒，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和适当地满足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1956年的工农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16.5%，工业产值增长31.1%（不包括手工业），这是1956年世界上工业生产增长最快的速度。同时，1956年职工工资提高了14%，解决了255万人的就业问题。所有这些事实，确凿地证明，1956年的财政工作是成功的，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的。右派分子抹煞财政工作成绩的企图，不能不在铁的事实面前宣告破产。

在1956年的财政工作中，我们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这就是1956年的国家预算执行结果发生了一点赤字，带来一些困难。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执行结果为什么会发生赤字的问题，除了李副总理在“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的国家预算草案报告”中指出的许多客观原因之外，就我们的具体工作方面来检查，主要是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設事業的大發展的形勢認識不足，對勞動人民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估計不足，總以為1956年預算的各項支出打的大，很可能有一部分花不出去，估計年末還會有一筆結餘，可以滿足銀行信貸資金的需要。基於這種估計，我們在編制預算的時候，動用上年度預算結餘資金，以致預算出現赤字，造成物資供應的緊張狀態，這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是人們主觀認識同客觀情況不一致的錯誤。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演中教導我們說，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毛主席的教導是十分正確的。我們應當從1956年財政工作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改進工作。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以1956年工作的一些難以避免的缺點和錯誤為借口，掉轉矛頭對準社會主義的財政攻擊。右派分子故意迴避1956年我國社會大變動的種種客觀情況，也不承認我們對1956年客觀形勢估計不足的主觀原因，右派分子一口咬定，1956年財政工作是搞糟了。為什麼搞糟了呢？右派分子說這是同社會主義財政本質有關。這是從財政方面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个明目張膽的攻擊。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國家預算是社會主義分配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它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个側面——分配關係。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預算，能夠有計劃的集中資金和合理分配資金，使積累基金同消費基金之間保持正確的比例，從而保證國民經濟迅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決定的。然而我們認為，儘管“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不是萬能的。無論怎樣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發生嚴重的錯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預算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在我們日常工作中產生各種各樣的缺點、錯誤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因為，人們在進行工作的過程中，主觀認識同客觀實際之間是有矛盾的。為了不斷地克服這種矛盾，達到主客觀一致，重要的是提高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樹立正確工作方法和作風，從實踐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分子說財政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同社會主義財政本質有聯繫，無非是說財政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按照邏輯推論下去，右派分子無非是要得出這樣的結論：要糾正錯誤就得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從財政方面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的一付猙獰面目。

資產階級右派還惡毒地攻擊黨對財政工作的領導，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復辟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財政“理論”，從而為復辟資本主義制度開辟道路。於是，他們就進一步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右派分子說，目前財經工作之所以“處在危機的階段中”乃是由于“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是“碰壁試試，主觀主義，盲目行事，並未遵循什麼客觀規律，也不知道有什麼客觀規律可以遵循”。

盡人皆知，全國解放不久，我國實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政統一。在我國國民經濟長期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只花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國家就消滅了財政赤字，補滅了十二年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災難，保證了市場的穩定。從1951年起，國家預算不僅達到了收支平衡，而且還有了結餘。在解放後第三年（1952年），我國就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黨對財政工作的正確領導，堅持貫徹了增產節約的方針，有效地積累和正確分配資金，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解放後已經解決了1300萬人的就業問題。

實踐是真理的試金石。我國財政工作取得的輝煌成績，證明黨對財政工作的領導是正確的，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同時，我國財政工作取得的輝煌成績，證明黨是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並且吸取了蘇聯的有益的經驗，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在財政工作方面，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諸如我們黨提出“從經濟到財政”的方針，也就是說，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財政收入，而在財政支出方面，又必須滿足發展生產的需要和有利於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這個方針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同分配之間相互關係的原理制定的；我國的預算設計採取預算計劃同國民經濟計劃相互制約、統一平衡的原則，這個原則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再生產必須按比例發展的原理制定的；在資金分配上，採取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的道路，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甲乙兩部類對比關係原理，以及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基礎的原理制定的；在擴大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原則乃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是為了人及其需要以及積累是社會最進步的職能的原理制定的；等等。事實證明，正是因為我們依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闡明的客觀規律，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並且從我國國情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闡明的普遍規律和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用來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突

踐，才保證財政工作獲得巨大的成就。右派分子為什麼要誣蔑黨對財政工作的領導呢？右派分子的政治陰謀從他們自己的嘴里說出了，他們公然叫喊國家財政領導部門應當把“本身工作中提出一些有關方針政策的理論原則問題，交給經濟科學工作者去解決，或者在方針政策決定之前，征求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參與討論”。這就是說，右派分子打着科學研究的旗號，披上科學工作者的外衣，極盡誣蔑黨對財政工作的領導的能事，原是要奪取國家財政工作的領導權、圖謀復辟資產階級政制度。

黨對財政工作的領導是正確的，因為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把它運用來指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右派分子看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反對黨的領導，必須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他們馬上又把進攻的矛頭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聲嘶力竭的叫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教條，過時了，不中用了。他們說“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的四海皆准的規律”，“許多經典著作寫作於百年以前，對於百年來的事物只能預見其大，不能洞燭几微”，又說“目前我們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科學只是指導階級鬥爭的；而不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規律”。“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是出版於身後，又怎能必其字字珠玉呢？”右派分子為什麼這樣惡毒地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呢？他們也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他們叫喊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時了，不中用了，原來是要破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凱恩斯主義。^{*}右派分子公然要求“對待資產階級經濟學應該首先進行透徹的研究，然後考慮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問題。……而不要對之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他們力圖用資產階級一套財政“理論”來指導我國的財政工作和財政政策的制定。

能不能把資產階級一套財政“理論”搬來指導我國財政工作和財政政策的制定呢？我們認為，財政科學是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的。我國財政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是為勞動人民幸福、為人類和平事業服務的。而資產階級財政，像美國、英國的財政，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它是剝削勞動人民的財政，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財政，在帝國主義階段，它是擴軍備戰的財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都處於面臨可怕的經濟危機到來的前夜。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主張實行赤字預算、軍火預算的反動政策，妄圖用國家干涉經濟的辦法作為挽救資本主義的滅亡的一張起死回

生的藥方。事實證明，這張藥方是治不了資本主義的絕症的。至於我國能不能用凱恩斯主義來指導我國的財政工作呢？能不能實行赤字預算呢？當然不能。道理很簡單，如果在我國按照右派分子的“建議”去辦，實行赤字預算。那末，我國的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就被破壞，市場物價的穩定就被動搖，代之而來的是物價飛漲，投機活動猖獗，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機就會到來。這正是右派分子夢寐以求的“良辰美景”。可是，儘管夢是甜蜜的，但夢畢竟是夢，中國人民決不容許資產階級右派的“美夢”變成現實。

資產階級右派為了達到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目的，他們還對國家稅收政策進行誣蔑，挑撥國家同農民的关系，國家同資產階級的关系。他們妄想煽起群眾的不滿，作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本。可是，資產階級右派算盤又打錯了，他們的挑撥很快被群眾識破了。

資產階級右派攻擊國家的農業稅負擔政策，他們說，農業生產發展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原因在於農業稅負擔過重了。農業稅負擔重不重呢？當然不重，黨為了有利於調動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並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改善農民生活，實行了穩定負擔的政策。由於農業生產逐年提高，而農業稅征收額基本上穩定。因此，農業稅征收額占農業實產量的比例，已從1952年的13.2%，下降為1956年的10.7%。如果在農民收入方面，把副業的產值計算進去，在農民負擔方面，把農村的其他稅收計算在內，農民負擔占農副業總產值的比例，已從1952年的7.5%，下降為1956年的6%。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攻擊國家的工商稅收政策。他們說“稅收問題是嚴霜”，“稅收政策是剝削多端”，“影響了生產”，國家的工商稅收政策是不是“嚴霜”，是不是“剝削多端”，是不是“影響了生產”呢？事實勝於雄辯。正由於黨根據我國情況制定了正確的工商稅收的負擔政策，解放後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並沒有遭到“嚴霜”摧殘。事實正相反，解放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都有了相當的發展。這種情況在舊中國是沒有的。盡人皆知，解放前，我國民族工商業受到本國的官僚資本和外國的資本双重壓迫，苟延殘喘，根本沒有發展的余地。當然，中國共產黨向來不否認我們的各種政策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工商稅收政策也是一樣，它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這個政策有利利用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面，又有限制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資

^{*} 關於反動的凱恩斯經濟學說，請參閱1957年9月21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北京大學樊弘教授所著“凱恩斯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有什麼價值”一文。

揭穿陈振汉等 攻击国家财政工作的政治阴谋

陈如龙

陈振汉等提出的“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纲领。这是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经济学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的发挥。它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思想上实现资产阶级的领导。它抹煞党领导财经工作的伟大成就，借口反对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企图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掌握国家机密和参与制定财经政策，在政治上来篡夺财经方面的领导权，替资本主义复辟开路。

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纲领曾攻击我们“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作客观规律”。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书中，则进一步污蔑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都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他们说，我们的工作偏差幅度很大，搞得很糟。

几年来，我国的财政工作是不是盲目行事呢？是不是偏差幅度很大呢？实践是真理的试金石。让事实来作公平的裁判吧！

我们先回顾一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财政工作情况。

全国解放不久，我国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财政的统一。在我国经济遭到长期破坏的情况下，国家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扑灭了旧中国十二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灾难，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从1951年起，我国预算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结余。到了1952年年底，也就是解放后的第三年，我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

务。这样伟大的成就，难道是盲目行事的结果吗？能够说偏差幅度很大吗？其实，连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会经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仅能管好政治，而且也能管好经济。可是，陈振汉等却偏要把成绩看成偏差，看成盲目行事。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工作情况。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我国财政工作执行了增产节约的方针，有效地积累和正确分配资金，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算收支均有很大的增长，预算收入，1957年预计比1952年增长67.39%；预算支出，1957年预计比1952年增长75.10%。在资金分配方面，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支出的比重增大了，用于国防和行政支出的比重却缩小了。经济建设支出，1952年为45.4%，1957年上升为46.7%；社会文教支出，1952年为13.6%，1957年上升为16.5%；国防和行政支出，1952年为36.3%，1957年下降为27.1%。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对国民经济的投资增加，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转扩大了。以1952年作为100，195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1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0.4%，社会商品流转额增长了68.08%。

我们在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政策上，执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2年为32.7%，1956年已上升到45.6%；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

比重的比重，1952年为32.7%，1956年已上升到45.6%；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52年为32.7%，1956年已上升到45.6%。这种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资产阶级右派对国家工商税收政策的恶意攻击，正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限制，热衷于走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道路的阶级本能的强烈表现。我们要揭穿右派分子的谎言，打破右派分子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是从来不会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在肯定工作成绩的时候，向来不否

认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并采纳其中正确的部分，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在我国诞生不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我国工业化的任务正在完成中，新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够，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客观规律还不可能都是很完整地、很明确地为人们所掌握。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在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内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重要的是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了身，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

的比重，1952年为39.7%，1956年已上升到49.7%。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了。职工的平均工资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37%；农民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1956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比1950年增长136%。同时，解放以来，全国职工增加了1,300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显著的改善，表现在国家的社会文教费用支出方面，1952年社会文教费支出为22.8亿元，1957年达到48.35亿元（预算），比1952年增长112%。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政策，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方针，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在国民经济中，我们已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任务顺利地完成了，财政政策设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蓬勃发展，这难道是“碰碰试试”的结果吗？难道还不是恰恰证明我们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吗？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几年来的伟大成就，正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我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的财政，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我们一贯地执行了党所提出的“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也就是说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在资金的积累上要以生产为基础，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方针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同分配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制定的。我国的预算设计，采取预算计划同国民经济计划相互制约、统一平衡的原则，这个原则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的原理制定的。我们在基本建设资金分配上，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甲乙两部类对比关系原理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基础的原理

建立起来了，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新制度虽然还有一些缺点，但它能够不断地趋于完善。代表前进的阶级利益的人，把前进中的缺点看作继续努力的课题，而代表没落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却把它当作诋毁新制度、复辟旧制度的口实。这本来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人们的善意批评同右派分子的恶意攻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的财政工作，是服务于人民的正义的事业

制定的。

我们实行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担负起发展新经济、改造旧经济的任务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原理制定的。正因为我们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正确运用，才保证我们获得上述成就。陈振汉等有什么根据说我们是盲目行事，根本不懂得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资遵循呢？有什么根据说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呢？

我们在工作中也并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或产生了缺点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所致。例如，1953年财政工作曾犯过错误，把预算的上年结余动用了。没有考虑到银行信贷资金的需要，一度造成紧张局面。这个错误正是说明当时我国的财经工作，还受到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影响，因为按照资产阶级财政理论，预算的上年结余是可以动用的。1953年的错误，我党很快地就在自己工作中发现，采取了措施，纠正了这个错误，使得1953年的国家预算执行结果，不仅未动用上年结余，而且本年还是收大于支，略有结余。但是陈振汉等人所攻击的，是这种性质的错误吗？不是，他们不是要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而是要我们摒弃马列主义，要我们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吗？事实证明，陈振汉等恶毒地攻击财政工作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无非是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陈振汉在意见书中，还集中地攻击1956年的财政工作，说什么“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

1956年的财政工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还是让事实来答复这个问题吧。

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5年增长了15.82%，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是增长得相当快的一年。

——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的事业资产阶级的右派是攻不倒的。但是，我们决不可低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这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谁战胜谁的斗争。我们全体财政工作人员和财政学界应当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财政“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